

【文学 文艺学研究】

## 革命年代的“精神证词”

### ——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与《建塔者》比较分析

张登林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台静农小说创作受鲁迅先生影响很大,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他的小说集《地之子》与《建塔者》各有特色。前者主要通过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乡土文学的启蒙主题,后者侧重运用主观抒情的笔调讴歌了革命先驱者的献身精神。从《地之子》到《建塔者》,是作者自身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是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台静农的“精神证词”。

**关键词:**台静农;《地之子》;《建塔者》;启蒙;革命;现实主义;浪漫抒情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6-0085-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台静农是在鲁迅先生直接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重要作家,其在未名社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是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对于前者,研究者较多,且成果不少;对于后者,因其艺术成就不及前者,所以研究者不多,成果也较少。其实这两部小说集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地之子》反映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的厚重,那么《建塔者》则表现了以精诚赤血供奉于唯一信仰的“先知者”斗争精神的“大时代的一痕”;如果说前者表现的是启蒙思想的无声呐喊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自觉实践,那么后者则是革命文学主题的明确声张和浪漫抒情特质的急切彰显。从《地之子》到《建塔者》,是作者自身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是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台静农的“精神证词”。

1928年11月,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出版。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这样评价道:“……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sup>[1]1088</sup>师承着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台静农以满腔的悲愤和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宗法制乡村的血与肉,生与死。《地之子》中的乡间,闭塞、灰冷,邪气缠绕在每个角落,令人感到压抑和无助。《蚯蚓们》描写的是荒年造成的“民变”。当稻草湾的穷人们因荒年被逼向田主讨借贷时,却被田主们告了“民变”,上头派了兵,将这些“胆大”的人,一个个捆走了。五家村勤俭老实的农民李小因求贷无门,无法养活老婆孩子,只好含悲忍泪以四十串钱的价格卖掉了妻小。《负伤者》中的吴大郎,妻子被乡绅张二爷霸占去了,脚背被张二爷砍伤,自己反而遭到关押。警察署长以十五块大洋的身价,逼他在卖妻字据上画押,吴大郎只有背井离乡。当他醉酒壮胆回家探视时,又被加上“黑夜行凶”的罪名,押到县衙去了。

收稿日期:2013-09-24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未名社中的皖籍作家群研究”(AHSK11-12D259)

作者简介:张登林(1968-),男,安徽庐江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这部小说集中,作家不仅写出了传统等级制度和封建习俗造成的乡村悲剧,而且写出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和社会动乱给乡村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烛焰》中聪慧漂亮的少女翠儿,便是夫权制社会的牺牲品。当她的未婚夫——吴家少爷已病入膏肓时,怜爱她的父母却以“女儿毕竟是人家人”为由,将她嫁到夫家去“冲喜”。过门不到三四天,她就身着白衣哭送灵柩了。这种野蛮的“冲喜”习俗,反映了“夫为妻纲”的宗法制度下女性价值荡然无存的残酷现实。《新坟》中的四太太,原来家境较为殷实,丈夫在衙门做事,“家里是出一屋进一屋,倒是何等的风光”。丈夫死后,她的理想在于儿女成人,男婚女嫁。但一场兵变,打破了她的梦想,女儿被大兵奸死,儿子被大兵打死,家产被族叔骗走,四太太只好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最后精神错乱,整天叫着“女儿嫁了,媳妇娶了”的疯话,在紊乱、虚幻的错觉中寻求最后的安慰。

《地之子》的悲剧色彩相当浓郁。刘以鬯认为,“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sup>[2]496</sup>。这是很有见地的。出身于未名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台静农,似乎专注地师承了鲁迅小说“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风格,把中国乡间的恐怖与人们的不幸和盘托出,这就带来了《地之子》的厚重。

1930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建塔者》,一部分仍是乡土题材,一部分已扩大到描写革命者的殉难,这是作者文学视域的拓展。此集虽不及《地之子》的悲哀、淳朴,但却能及时感应时代风云,真诚反映“先知者”以精诚赤血为信仰而斗争的“大时代的一痕”。

短篇《建塔者》写一个释放出狱的革命者以革命见证人的身份讲述同牢难友被害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些青年烈士们,为了革命是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在被囚车押上刑场时,还唱着革命歌曲,从容赴死。特别是女革命者玛丽,“俨然一位刚强的男子”,她牺牲时和三位男青年一起从容悲壮地唱着歌,“全身的血脉,要同暴风雨一般”。《死室的彗星》写牢狱中的革命青年庚辰君在狱中受尽折磨,但他宁死不屈,最终“成就了他的伟大”。《历史的病轮》中的女革命者曼乔君,有兄妹三人,母亲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守寡,但不幸却降临到这位母亲的身上,女儿曼乔为了革命而牺牲在刑场上了。曼乔是一个“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人,因为“她的希望,不是个人的身后,而是人类的将来”。《遗简》通过革命者K的书信呈现了革命者对革命与爱情关系的理解。在革命者K看来,负着“人群”使命的人,不能白白销毁自己的生命。他说他更了解爱情。“爱情有如河堤,堤口一决,便汪洋澎湃不可收拾了!洪水所经,田园,林木,牧场,以及人间最闲适与最快乐的生活,都要毁灭于这不可制止的波浪中”,所以,爱情的毒焰,比鸩酒还可怕。一个有为青年,在“黑暗的势力与民间的凄苦没有扫除以前,我们不能从容偷安于另一世界的生活”。所以革命者K选择了革命,因为他是一个为人类生活着的人,“从此以后,更无所谓我了,因为我已不属于我,仍旧是献给人群了”。K说,“我珍视我的工作,甚于我的生命,我觉得人间所有的崇高和伟大,只有我的唯一的工作”。看来,革命者之所以能够忍受非人的折磨,就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新时代;革命者之所以能够放弃一切,不怕流血牺牲,是因为“新时代的光芒”正是“发动于这种情况下的”。

相较于《地之子》,《建塔者》中的思想显得更为激进,其中大部分作品表现了作家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慨和向往光明未来的激情,讴歌了先知者以精诚赤血供奉于唯一信仰的献身精神。

## 二

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启蒙主题在小说中的表现非常鲜明。是鲁迅先生率先进入这块园地,并且把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初步展示了现代启蒙文学的特征与风采。可以说,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很难说有谁比鲁迅对农民怀有更深的感情,更没有谁像他那样清醒地看到和写出农民的精神状态。台静农自觉师承鲁迅先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一个个乡间死生的故事,冷静客观地展现了20世纪初故乡皖西地区“地之子”们的苦难和辛酸。

《天二哥》中的天二哥,是个阿Q式的底层农民,自小就会喝酒,活了三十多年,从没有同酒离开过。这次因为身体有些不舒服,于是凑足四百文钱买烧酒喝,对他来说,酒便是良药。酒醉了以后,他摸了一个卖粥的大白碗,左歪右斜踉踉跄跄地跑到栅门口的尿池前,接连舀喝了两大碗清尿,因为这是他爹传下来的解酒的老法子。对于他的死,人们总不能正确地认识,认为是“阎王爷从黑色的生死簿子,圈将下来,交给牛头马面的,所以就不早不迟地在昨天下半夜将他结果了”,他们不知道,正是贫穷、疾病、酒精中毒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要了天二哥

的命。《红灯》写老年丧子的得银娘为了超度死去的儿子,想糊一个小小的纸灯,因为她总是相信得银的鬼魂是能够回到本乡本土的。但眼下一文钱没有,偶然抬头看见获柴的破墙上夹有去年剩下的一张小小的红纸,于是就用这小小的红纸为儿子糊一个超度的红灯。为了弄竹篾作灯骨,她往杨太太的园里去求一棵竹子。将新竹拿到家,她辛勤地将竹子破成四片,再破时,竹片一软,刀竟落在左手的食指上,鲜血迅速地流出,她也不觉得痛,用颤栗的右手抓了一些香灰敷在创口上,用布裹好。看着自己糊好的美丽的小小红灯,她欢欣的痛楚的心好像惊讶她竟完成了这种“至大的工作”。小说写得愈精细,得银娘的愚昧、迷信就表现得愈深刻,当然她对儿子的爱也愈发显得深沉和厚重。

在《地之子》中,农民们的不幸遭际,除兵匪战乱、天灾荒年等原因外,无不与地方上的官绅土豪有直接关系。在《负伤者》中,作家具体描写了地方劣绅勾结官府粗暴地强占乡民妻室的惊人事实。“有钱有势”的张二爷,长期霸占良民吴大郎的妻子,逼得吴大郎有家难回,整天在外面流浪。当他带着不满和愤慨来反抗时,不仅遭到张二爷打来的耳光,还被张二爷用菜刀砍伤了脚背。对于卖妻,吴大郎一开始当然是不同意的,因署长拿坐牢来威胁他,他只有在早已写好的字据上按手印。明明是仗着权势强行霸占别人的妻子,字据上却写着立卖人“因无钱使用,情愿将女人出卖于赵果斋二老爷为妾”的字样;明明字据上写着大洋五十元,却硬说成是十五元,署长借此机会捞了十七元。农民吴大郎所受的伤,既是肉体上的,同时又是精神上的。

《建塔者》集中的10个短篇均创作于1928年。这是个特别的年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思想文化的新开场,创造社成员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等人更加自觉地打出了文化批判的旗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进行了历史性的批判与结算。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指出,“在我们,重新来定义‘文学’,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他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特点在它的“组织能力”,而在阶级社会中,它是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工具。他提出,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sup>[3]72-73</sup>。对此,最早的革命作家蒋光慈表达得更加具体明确。他说:“中国现代的社会再黑暗没有了,所谓一般的民众受两重的压迫——军阀和帝国主义,再进一层说,所谓一般贫苦的群众们之所受压迫,更不可以想象。在这一种黑暗状态下,倘若我们听见几个文学家的反抗声,倘若我们听见几个文学家的革命之歌,则我们将引以为荣,因为文学家是代表社会的情绪的(我始终是这样的主张),并且文学家负有鼓动社会的情绪之职任,我们听见了文学家的高呼狂喊,可以证明社会的情绪不是死的,并且有奋兴的希望。”<sup>[4]409</sup>

在这种文学思潮影响下,台静农自觉地用小说创作表现大时代这个伟大的使命。对旧时代破毁的彻底,对新时代创造的自信,构成了《建塔者》悲愤激越的基调。作者在小说中着重描写了1928年前后那个特定时代里的腥风血雨以及“时代先知们”的伟美人格。其实这种激进情绪在《地之子》首篇《我的邻居》中已有流露,小说以沉郁之笔描写了一个朝鲜爱国者为国雪耻、以身殉难的侧影。到了《建塔者》时期,这种激进倾向表现得更加充分和鲜明了。他称这些赤诚的青年为“时代的先知”,“晨曦的使者”,称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是建设“我们崇高的人群的塔”。短篇《建塔者》写一个释放出狱的革命者回忆四个革命者的壮烈牺牲。革命者A、D、E和E的初恋情人玛丽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走向了刑场,他们被囚车押走时,还唱着革命歌曲。《昨夜》写“我”坐轮船送别革命者“秋”的一段经历。在白色恐怖下,反动派查禁森严,到处是宪兵,到处是警察,小说既写出了地下工作者的危险,又写出了狱中革命者的壮烈牺牲。“在大的恐怖中,我们的伙伴与平日所敬爱的人,都被攫了去。甚至我们眼睁睁看着敌人将我们的伙伴毁死了”,不过,他们并不为白色恐怖所吓倒。秋说:“死又算什么?……我们的血一点也不能爱惜的。”《死室的彗星》写“我”和医科大学逸生君的狱中偶遇。在监狱中,夜晚严刑拷打革命者是常有的事。逸生君的革命伴侣庚辰君尽管受尽折磨,但并不透露革命消息,最终“成就了他的伟大”。

《建塔者》集中有几篇小说是承袭《地之子》遗风的。《人彘》通过儿时的回忆,写驻防士兵杀死欠租佃户的残忍故事;《井》写田主对佃户残酷的劳役和地租剥削,使得佃户父子两代先后身亡的悲惨人生。值得注意的是,《井》虽然延续了早期乡土小说写实的沉郁风格,但最后写到这个佃户的二儿子二牛觉悟了,他感到这个社会充满了“猛蛇的毒液和无产者的血腥”,相信工农才是拨动人类进化的齿轮,于是毅然到南方参加国民革命。小说结尾写到:“在海南革命的火焰正在光芒四射的时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触机待发的时候,他忠诚地作了一个英勇的战士。他以肮脏的脚步,迈进新的时代;他以泥土的手,创造全人类的新的生活。”因此,这篇小说比《地之子》

中类似题材的作品明显多了一些阶级意识,也多了一些亮色。

杨义认为,《建塔者》的激进倾向是可贵的,但因作者对革命生活的了解殊为有限,所以在这方面的生活底子比起农村生活的积累,就显得单薄了些<sup>[2]500</sup>。另外,就艺术成就而言,《建塔者》也不及《地之子》,所以这部小说集问世后不久,就有人评论道:“严格地讲,这集里所收的文字,十之八九是不能具有完整的短篇小说的外形,所以说它是些‘手记’与随笔,我觉得是更适当的。”<sup>[2]500</sup>正因为如此,《建塔者》的主观抒情色彩就显得相当突出。

### 三

《地之子》的格调沉郁阴冷,手法质朴圆熟,出色地写出了当时乡村社会的环境气氛。《天二哥》写一个乡间酒徒看似英雄豪爽实则愚昧无聊的死。小说开头写了饭店门口的闲谈,有人说他的死是难逃的天数,有人说他死后变鬼吓人,有人为他撕纸钱招魂祷告。这个酒徒的死其实是这种愚昧乡风的必然产物。《烛焰》的开头写吴家的出殡行列,写翠儿不胜哀伤的哭泣,写民众观灯似的围观,写各种各样的人对这场“冲喜”和出丧的议论,小说以倒叙手法把“冲喜”的结局一下子展现在读者眼前,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成一种凄惨的氛围。台静农在小说的剪裁和布局时,善于抓住高潮中的一段,写深写透,因而显得用笔简洁而结构严谨。《蚯蚓们》集中描写李小卖妻的一个晚上,把他家庭的穷困,夫妻间的矛盾和留恋,儿子的稚气和无知,旁人的冷漠和主人公的烦躁、混乱、哀伤、羞愧的复杂心情交织在阴森夜色和黯淡灯光中,笔力遒劲,色彩沉郁,苦涩之味令舌根发麻。《新坟》的运笔尤为灵活。作者从不同角度描写了这一令人辛酸的人间悲剧:从茶馆闲人的聚谈中,点出四太太发疯的原因是大兵对她儿女的屠杀和奸淫;从更夫的对饮夜谈中,交代她家所遭变故的过程,鞭挞了亲族叔撇下四太太母子,只顾自己逃命,事后又假装慈悲骗取其家产的无耻行径;通过地保之口,叙述了她以坟为家,自焚身死的悲惨结局。小说中间又断断续续地插入作家的叙述,写出了她生前的苦状和死后的惨象。这种描写方法就像许多摄像机对准同一场景,角度多变而焦点固定,表现灵活而不失严谨。《地之子》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圆熟还表现在他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精描细摹,真气扑人。《红灯》写得银娘劈竹制灯,伤了自己的手指,但仍忍痛扎灯,欢欣而痛楚地完成这种“至大的工作”。在《烛焰》中,翠儿行辞家礼仪时,香案左边的烛焰黯然萎谢,使惴惴不安的母亲难以拂去男方先逝的忧虑。这些细节描写与人物希望、疑虑、痛苦的心理交融在一起,使人读了悲哀泛起,感慨系之。

作为革命文学先声的《建塔者》,明显运用革命文学常用的“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其中以《死室的彗星》和《遗简》表现得最为突出。前者写一对恋人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故事,后者表达了如果革命和爱情难以两全,革命者应该牺牲爱情而选择革命的思想。由于作者同实际革命有着一定的隔膜,所以小说情节不够丰满,人物形象也显得有些苍白,但小说所体现的革命文学的类型特征的意义却是实际存在的。如果说《地之子》中的诸篇展示的“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是写实的、客观的,而当他将笔触移到写都市的革命和革命者的斗争精神时,他就再也无法写实,无法客观了,所以此集中的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抒情散文,是诗章,虽然没有客观的生动的画面,但感情却是真挚的<sup>[9]</sup>。

《建塔者》的抒情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小说大多运用第一人称,而且不少是书信体,这样就给感情的抒发提供了便利。譬如首篇《建塔者》,开头用对话的方式直接表白:“你知道,我们的塔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泥土和顽石上面;我们的血凝成的鲜红的血块,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朋友,你一定要我作絮絮不休的谈话,我向你说明什么呢?”直接对话,情感真诚。其次,用价值取向分明的褒义词和贬义词表明自己的情感态度。如描写革命者E是“英勇可爱的少年”,玛丽“俨然是一位刚强的男子”,同时又是一个“再温柔不过的美人儿”,这样的俊美青年却为了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读后不禁令人扼腕。而对国民党反动特务、狱警,小说则称之为“猎犬”、“豺狼”。《死室的彗星》中对女狱警的描写是长着一幅“狡猾相”,“两眼楞着,脸上一点血色都没,好像是一种灰黄的皱纹纸糊成的面具似的”。态度分明,情感立场立现。第三,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譬如小说写革命者的英勇就义行为完全是激越的浪漫主义抒情方式:“寒夜里,黯淡的月光下,一群武装的人,围着一辆大车,静默地提起步伐走着。大车中坐着三个青年,一个少女,他们从容地悲壮地唱着歌,高呼着万岁。……歌声逐渐消逝在大野里。最后,仅剩有一种孤独的歌声,这歌声在寒空中孤峭颤栗,但仍旧是阴森和壮烈。”小说在结尾自豪地宣布:“从此我们塔的伟大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份新的力量了!”由于作者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风向标,在抒发自己

感情的同时,抒情主体已经从个体走向群体,从知识者走向劳苦大众,因此《建塔者》中的革命者们,总是以“我们”来代替“我”,自觉地承担起大众代言人的角色。

台湾学者乐蘅君认为,台静农的这些作品令人联想到,那时新潮少年的台先生,似乎有乌托邦思想的倾向<sup>①</sup>。的确,台静农创作《建塔者》时,也不过二十六岁,正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年龄。

#### 四

台静农在《地之子》后记中曾谈到,他之所以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和韦素园的劝勉鼓励密切相关的。他认为自己不大乐于走这条路,因为人间的酸辛和凄楚,于他耳边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已是不堪了,现在又将这些用心血写出,是件不幸的事。尽管写作对台静农来说可能是件痛苦的事,不幸的事,但对现代文学来说,却是件幸事,因为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没有比他更多、更勤的了。面对民众的苦难,身处革命的大变动时代,有良知的作家自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到了《建塔者》,“地之子”们的苦难必然要导致一批先知者的献身行动,台静农以满腔热诚去讴歌这些先知者,赞颂他们的伟业。纵观台静农的小说创作生涯,如果称《地之子》为他的黄金时代,那么《建塔者》则为他的转折时代,追随时代潮流、感应时代精神是小说家台静农的一个明显特征。确定台静农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的,当然是《地之子》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篇章,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以“以精诚以赤血供奉于唯一的信仰”的《建塔者》的文学史意义。

#### 参考文献:

-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鲁迅全集.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3]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 [4]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C]//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 [5]夏明钊.论台静农小说集《建塔者》的特殊意义[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64-70.

### Revolution Age's "Spiritual Evidenc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ai Jingnong's *Son of Ground* and *Tower Builder*

Zhang Deng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ai Jingnong's novel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Lu Xun, but also shows its own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creation. His collectives *Son of Ground* and *Tower Builder*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former mainly uses realistic skill to express the native-soil literature's theme of enlightenment. The latter particularly utilizes subjective lyricism tone to extol the devoted spirit of revolutionary pioneer. From *Son of Ground* to *Tower Builder*, this is the author's logical thoughts' consequent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he "Spiritual Evidence" of youth Tai Jingnong who pursues progres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light.

**Key words:** Tai Jingnong; *Son of Ground*; *Tower Builder*;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realism; romanism and lyricism

(责任编辑 王作)